

夾縫求生： 戰後台灣本省籍作家社群結構的形成（1950-1973）*

張皓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eric2220330@gmail.com

摘 要

1945 年以降的戰後台灣，絕大多數台灣本省籍作家面臨寫作語言轉換困境，許多在日本教育下成長、不諳中文書寫的創作者不得不放棄寫作。然而，部分本省作家並未因此放棄文學志業，他們從邊緣出發，試圖集結社群以克服結構困境、延續寫作生涯。歷經多年沉潛後，無論是在創作者、編輯，乃至於社群陣地及評論家，本省作家群體終於在文學生產場域中完成初步佔位。

本文嘗試採取一整體性觀點，首先參考 Bourdieu 的文學場域互動論及 Escarpit 的作家「班底」（Equipe）理論框架，從文學場域運作情形與外部結構進行考察，並運用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技術，初步分析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多數本省作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關係，進而理解戰後本省作家無論從主流報章副刊的發表版面，乃至作家社群組織，各團體中行動者之間具有頻繁的社會互動關係，不僅確立作家班底雛型，也發掘新興創作者，形成戰後本省作家的整體社群支持結構。

關鍵字：場域、班底、本省籍作家、社會網絡、社群結構

◎ 收稿日期：2024 年 8 月 28 日；審查通過日期：2025 年 3 月 10 日。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8 年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之第五屆藝術社會學研討會《文學與社會》，且在撰寫初稿期間承蒙王梅香老師、洪儀真老師針對論文及摘要陳述方式的悉心指導，對此不勝感激。另外更十分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許多寶貴意見與文章修訂建議，至於一切文責皆由作者自負。

一、前言：戰後台灣本省籍作家的「夾縫求生」

（一）尚未整合性考察的本省籍作家社群結構

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許多過往曾活躍於殖民地台灣下，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職志的台灣作家們，即開始要為「建立富於台灣文化色彩的台灣文學以躋入世界文學之林」而努力（葉石濤，1973：72）。但此時迎接他們的卻非藝文土壤復興，而是因寫作語言轉換所帶來的創作困境。國民政府於接管台灣一年後即全面禁止官方日文並廢除日文版報章、專欄，此舉對於戰前在日文教育環境下成長的台灣本省籍（以下簡稱本省）作家¹無疑為一打擊，迫使大部分不諳中文書寫的他們不得不放棄寫志業；即便是較熟悉中文書寫的本省作家，也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及往後 1950 年代起白色恐怖的政治壓迫下禁聲。而此一文學真空期階段，便由當時遷移來台的大量外省作家所佔位，並且在國民黨政權鼓勵下，各式「反共」文學大行其道。

但同一時間也有許多本省青年作家並未放棄其創作理想。他們相互串連，彼此砥礪且試圖增加能見度，例如鍾肇政建立《文友通訊》團體，策略性開拓投稿空間；而稍有能力之戰前作家如吳濁流則於往後號召跨世代本省籍作家一同創辦《台灣文藝》雜誌，企圖將戰前台籍、戰後本省作家集結在一起，藉以整合資源與培育台灣新文學的下一批作家世代。經歷約莫三十年沉寂後，戰後第二代本省籍作家如陳映真、王拓等人即迎來挑戰主流文學權力場域之契機，積極投身鄉土文學論戰當中。

台灣文學研究學界自 1990 年代步入建制化，迄今已對戰後本省籍作家們的創作思想及論述活動歷程累積一系列豐富研究：無論是作品分析、文學史觀考察，甚有社會學者如吳介民（2004）試圖探討戰後鄉土文學論戰時文化界公共領域的形成與其中各派對理想社會之想像，以及蕭阿勤（2012）探討 1980 年代以降本省籍文化人士，包含文學作家、文學評論家等在台灣民族主義發展歷程中所發揮的影響力。而主流研究觀點也多一致認同戰後台灣的文學場域明顯存在語言及文學典範移轉的結構性限制，大大壓縮了本省作家生存空間（陳芳明，2011：34-35；吳介民，2004；黃惠禎，2016：40；路丹妮、陳正賢，2015：153-190）。但關於本省籍作家群體何以支撐過戰後至 1970 年代政

¹ 為求身分定義之精確，除了台灣本省籍的共同身分之外，本文會將 1949 年國府撤退來台之前，主要接受日文教育、活躍戰前文壇的台灣省籍作家稱之為台籍作家，而後在考察國府遷台後的歷史過程時，再將戰後台灣省籍作家稱之為本省作家，其中包含戰後第一代及第二代本省作家。

治／文化權力支配時期，不致因邊緣化而完全無以為繼，當今多數研究者觀點往往僅針對個別組織、刊物及文壇活動者進行討論，尚不能完全掌握整體社群支持結構的形貌。

緣於部分研究者如張誦聖（2005，2011）提倡以「文學體制」、「場域觀」等整體性概念考察戰後台灣文學場域中各美學主義勢力消長的觀點啟發，本文核心目標，便係以整體性角度出發，並且進一步考察文學生產場域當中台灣本省籍行動者之間的社群互動關係，試圖勾勒出更為寬廣的台灣本省籍創作者社會互動圖像，進而理解戰後初期至1970年代間，作家們是如何整合其文化資源、互助且培育人才，並形成一股往後可能挑戰權力場域的社群能量。

在處理本文研究課題上，文學社會學界早已有相當豐富的分析性理論基礎存在，因此本文將會援引 Bourdieu 的文學生產場域與權力場域互動理論，以及 Escarpit 的作家「班底」觀點，作為整體性分析所參照的理論框架。

（二） 整體性理論架構及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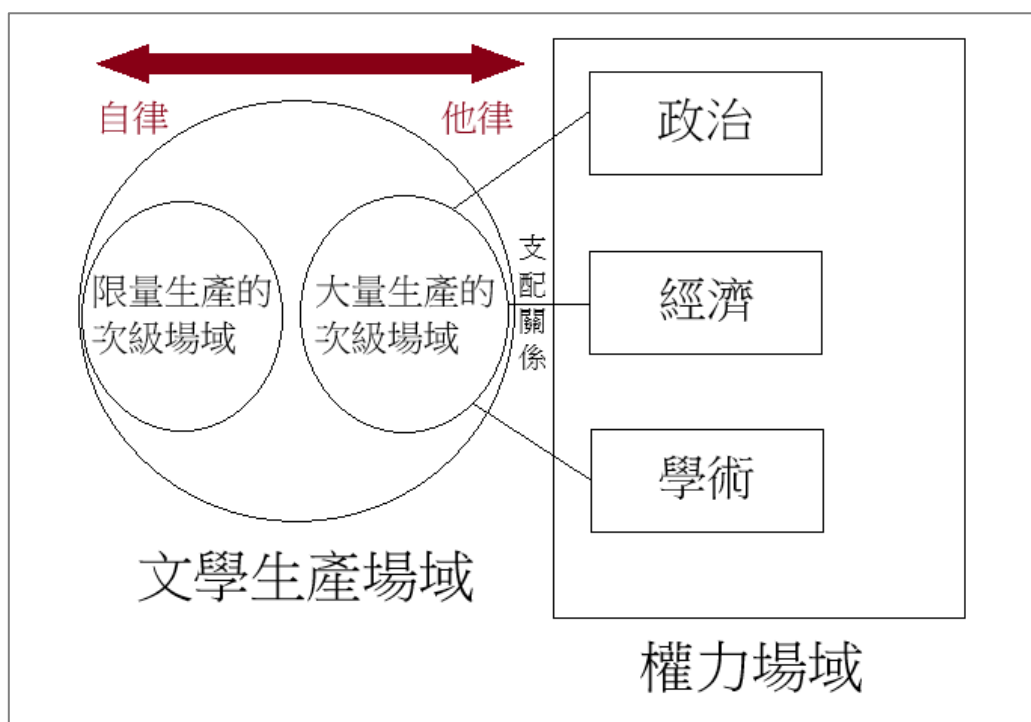
關於文學內部運作與外部力量的互動過程，首先可以「場域」（field）概念加以解釋之：所謂場域，即是一個由內部各角色位置所存在的，諸如支配、從屬、互補，甚至是敵對等關係交織而成的網絡，並在其內部各自有獨特運作邏輯，而各個場域彼此也會交互影響（Bourdieu 著、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277-288）。

以文學生產場域來說，若是在整體場域最具自主性的情況下，其內部是以「為藝術而藝術」為運作邏輯，崇尚高度自主性且通常拒斥資本生產場域運作邏輯。場域中各個角色的佔位，例如不同寫作體裁、風格、寫作手法、意識型態之區別等，皆是內部成員按照其獨特的文學場域邏輯進行鬥爭而達到的，這是一種位於光譜極端、強調自律原則的場域位置，又可被稱之為「限量生產的次級場域」（the sub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Bourdieu 著、石武耕等譯，2016：339）。

然而，外部權力場域卻會在某些特定時刻（如革命、政治及經濟危機、災難等）或特殊結構（如言論審查機制、商業生產邏輯等）下影響及支配文學生產場域，從而重組了成員各自的互動關係及他們所佔據的位置（Bourdieu 著、石武耕等譯，2016：94-263）。此時文學生產場域所依循的品質標準，源自於權力場域中佔據支配地位的外部階序原則（例如政治名望、商業成就、應用研究認證等），這種位居文學生產場域另一極端、受到他律制約的場域位置，則是「大量生產的次級場域」（the subfield of large scale production）（Bourdieu 著、石武耕等譯，2016：339）。

在本研究當中可參照的案例，即為戰後台灣的寫作語言強制轉換期，與提倡反共「口號」文學風潮，使得文學生產場域內的創作者群體組成大幅改變，並建置起統治者基於特定審美標準而主導發展的文化生產次級場域。

最終，我們可以用圖一呈現文學場域和權力場域之間互動關係的理論架構圖，並且根據此一分析框架，聚焦在考察戰後權力場域支配縫隙下，台灣本省籍作家的自主性文學生產場域及相關社群建置過程。



圖一 文學場域和權力場域互動關係的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另一方面，在討論文學外部結構的研究觀點中，Escarpit 針對如何研究「作家」社群的課題上，指出過往許多研究者的分析架構盲點：他們傾向以作家出生年代來分類。例如統計作家們的出生年代聚集在某些時期，然而這樣的分類方式易受年代「週期性」概念誤導。從歷史過程來看，「世代同儕」的出現其實是沒有任何週期性的，且文學人口的年齡層分布往往也無法歸納出一致性。相對而言，「班底」（Equipe）概念更適用於考察作家外部的社群結構。「班底」包含了所有年齡的作家群，且是指經由特定政治事件、歷史結構影響下，某些在輿論上已佔有一席之地且難以被撼動的作家集群（Escarpit 著、葉淑燕譯，1990：40-46）。

作家「班底」的辨識要件之一，便是集群成員擁有相似文學意識型態和輿論力量基礎。戰後本省作家「班底」的確立，係經由文學場域中具備相近省籍意識形態身分的各種角色如創作者、文學編輯、評論者皆完成佔位後，才得以配合政治條件變化逐步完成（Escarpit 著、葉淑燕譯，1990：40-46）。舉例來說，或許可將葉石濤視為「班底」概念建置過程的其中一位評論行動者。順應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政治氛圍，其於 1977 年 5 月發表將過往論點稍做擴充整理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經由文學史觀的建立，加以劃分了本土（台籍／本省籍）文學作家群體邊界。

參考作家班底的概念，本文也嘗試初步運用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呈現出戰前（約出生於 1920 年以前）、戰後本土第一代（約出生於 1920-1935 年間）、第二代作家（約出生於 1935-1945 年間）與各類創作發表平台的關聯性（是否於此刊物發表文章），²驗證這些本省作家是否已形成具備相近意識型態立場且跨越世代的同質性社群結構。

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為透過節點（node）與線（edge）之間形成的網絡系統來釐清諸如行動者／團體影響力、社會關係強弱，或行動者所處的訊息交流位置（例如接收者、傳遞者或彼此有雙向交流）等社會互動狀態的一種量化研究分析技術（Hanneman & Riddle, 2005）。藉由繪製社會網絡圖，計算單一節點（行動者）連接其他節點數、兩個節點在一定距離內共同連接節點數多寡，以及辨識連線的單／雙向（僅單方面接觸抑或互相認識）屬性，我們即可探勘由行動者的連帶關係所集結起的社會群體分佈情況，也得以推論處於不同網絡位置的行動者所屬之社會結構角色——無論係在控制社會互動網絡運作，或是汲取網絡中社會資源方面，不同結構位置的行動者將擁有不同的優勢或限制。

至於考察的社會網絡類型，則依據社會關係當中節點屬性差異，區分為一模網絡（1 mode-network）與二模網絡（2 mode-network）——基於單一類型節點構作的連線網絡為一模網絡，例如從行動者（人）之間的社會互動關係去分析整體作家社群當中有哪些人可能形成更緊密的派系／創作團體，而哪些人又是橫跨多個社交圈的資源中介者；由不同屬性節點所建立起的連線網絡，則屬於二模網絡，此種網絡可根據個人和團體之間的連線狀況，判別行動者與不同團體間可能的互動關係，例如以作家／編輯（行動者）和其參與投稿／編務的刊物（團體）的社會關係網絡，去觀察哪些人活躍於多個團體，

² 戰前作家與戰後第一代作家通常被俗稱「跨越語言一代」，即受過完整日本教育，並能夠以日文流利寫作，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卻難以將寫作語言轉換為中文者，其中戰前作家除葉石濤較早投入文壇以外，多出生自 1920 年以前，於戰前即有作品累積；戰後第一代作家則多為戰後才投入創作者；而戰後第二代作家則多為 1935 年以後出生，求學階段為戰後時期並在成年後能更加流利使用中文寫作者。

又有哪些創作者的社會活動其實十分集中於特定團體網絡，而不同社群之間行動者的社會互動關係又有可能是緊密抑或偏向各自孤立。

據此，本文將藉助 Gephi 社會網絡分析程式，進一步繪製多數本省創作者參與刊物活動之社會關係網絡圖（2 mode-network）及重要編輯／團體發起人與作家或是作家彼此之間的社會互動關係網絡圖（1 mode-network）。

綜上所述，本文欲採取整體性分析角度，將切入考察時間點設在戰後初期（1950 年代）至 1973 年鄉土文學論戰前四年，即葉石濤開始出版其作家評論集，建立整體作家社群想像論述的關鍵時間點為止，並將參考整體性理論框架，考察作家「班底」形成過程，以解釋戰後近三十年間本省籍作家如何運用社會網絡建立起跨世代的創作者社群，進而構築起翻轉文學場域主導性的潛在結構力量。

至於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材料來源為報章資料、作家書信、回憶錄與各類數位文史資料庫資源。除了《公論報》、《聯合報》、鍾肇政與鍾理和通信內容，以及吳濁流致鍾肇政書信內容、吳濁流回憶錄等第一手史料，零星資料則有林海音自傳、王鼎鈞及巫永福的回憶錄等，而其餘作家社會互動資訊的掌握，則參考自過去相關研究成果，以及《詩路：台灣現代詩網路聯盟》網站的數位典藏詩人資料庫、國立臺灣文學館書目檢索網站（《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庫》、《台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所記載作家生平與各項刊物發表文章紀錄，或是從報章文藝副刊中比對作者資訊，進一步驗證作家可能的投稿活動足跡。

二、 戰後文學生產場域的重構與其縫隙

（一） 戰後文學場域所遭遇到的政治支配

正如前言所提到，在脫離日本殖民後所面對的是官方語言轉換及後續言論審查的創作困境。但事實上，台灣籍作家在戰後初期（1945-1949）的文學場域重建期中並非從一開始就消聲匿跡，真正導致他們幾近全面退場、難以生存的關鍵因素，係來自於 1949 年起國府更加強勢的政治權力支配。

從較為深遠的脈絡來看，此一時期文學場域上各路作家積極活動，尤其是自日本殖民末期（1940 年代初期）開展起現實主義路線的台籍創作者活躍在各個刊物平台當中，與 1945 年台灣「光復」以後台灣本地知識分子高度響應「文化重建」（cultural

reconstruction）運動不無關聯——這段期間無論是來台的外省籍作家或本地台籍作家，皆各自創辦、主持著許多文藝發表園地，且在左翼／現實主義文學陣營逐漸合流下，出現兩地行動者互相合作的盛況（黃惠禎，2016：84-94）。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文學生產場域當中並未有省籍人才分佈失衡的情形：

如果以主要的發表場域來觀察，如《民報》、《台灣文化》、《人民導報》、《中華日報》、《和平日報》等報刊，可以看到《民報》上有楊雲萍擔任「文藝」版面的編輯，楊逵主編《和平日報》「新文學」；《台灣文化》雖是包含當時省內外、官方與民間各路人馬（台灣文化協進會），但主編蘇新與王白淵的影響力仍頗明顯；《中華日報》上亦有龍瑛宗主持日文「文藝欄」與「文化欄」。其餘如《人民導報》是由黃榮燦、木馬等大陸來台文化人主導，國民黨員樓憲、張禹等人則主持《和平日報》「新青年」等版面。這個約至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發生前，文藝版面的分布情形，大致上並沒有出現巨大的失衡現象，兩岸文人都具有相當「資本」來從事文學活動。（陳建忠，2007：181）

路丹妮、陳正賢（2015）以文學場域理論框架結合量化研究方法分析，觀察不同行動者在各刊物出版模式的差異，且在考慮政治力影響因素後，將當時文學場域中行動者大致區分為四個不同群集：自主性位置、權力與文學自主性互動位置、過渡位置、保守行動者位置。其中以外省來台的歌雷所主編之《台灣新生報》副刊「橋」佔據文學場域內最高自主性位置，眾多戰前已享負盛名的台籍作家，如楊逵、龍瑛宗、吳濁流、葉石濤等皆活躍於此。

而「橋」的本土化轉向，尤於 1948 年第 100 期後更為明顯：更多台灣作家的文學作品被刊登，甚至日本翻譯文學也出現於刊物當中。1947 年以降，「橋」刊登一系列圍繞在台灣文學歷史定位上的評論文章，至此影響許多刊物作品主題轉變，就連傾向官方政策立場的《中華日報》副刊「海風」於 1948 年後也逐漸轉向「中國文學分支」脈絡下的台灣文學主題（路丹妮、陳正賢，2015：175-177）。即使在二二八事件後已有部分台籍文壇人士引退，「橋」仍然以翻譯作品形式支持日文作家投稿。

但這所有文藝場域的重新起步與自主聲音，多在 1949 年後的白色恐怖戛然而止。例如 1949 年楊逵、林亨泰等人因四六事件相繼被逮捕、台籍青年作家社團「銀鈴會」被迫解散，1950 年代初期吳新榮因李鹿案牽連再次被捕、葉石濤入獄三年、張彥勳多次繫獄等，不勝枚舉的政治事件造成許多台籍作家文學活動被迫中斷（黃惠禎，2016：40）。如此重大轉變導致原先文學生產場域內部巨大震盪，且大幅破壞其自主性基礎，致使戰後初期台灣文壇進入實質意義的「文學真空期」。

直至 1949 年，國民政府自國共內戰失利後撤退來台，而隨之遷台的外省籍作家如鳳兮（馮放民）³、張道藩（張振宗）⁴、王平陵（王仰嵩）⁵、王藍⁶、陳紀滢（陳寄滢）⁷等人，在 1950 年代也逐漸站穩腳跟，以投入報章副刊編輯、建立中國文藝協會及各類文學刊物等方式，逐漸填補先前文學生產場域的部分真空位置。⁸除此之外，配合國民政府宣傳政策，當時檯面上主流的文藝版面，無論是《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公論報》及 1954 年以前的《聯合報》等主流報紙副刊，皆以提倡「反共抗俄」文學為優先出版原則（朱宥勳，2021：104-105）。官方更定期舉行「軍中文藝獎」、倡辦「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與「中國文藝協會」以獎助相關藝文作品。

一九五〇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台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且從我自己切身的事說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報》以「副刊編者作者聯誼會」的名義發來的信，約我到中山堂參加聯誼……聯誼會並無輕鬆的聯誼活動，反而很嚴肅地通過成立全國性的文藝團體……緊接著出現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和中國文藝協會，張道藩是兩會的主持人，一連串工作展開，徵求反共文學、反共歌曲、反共劇本，補助這些作品的出版、演唱和演出。（王鼎鈞，2009：134-135）

此一結構限制下，不僅非「口號」文學的發表機會渺茫，更間接形成省籍歧視結構，大大壓縮了台灣省籍作家生存空間：多數沒有反共經驗的台灣省籍作家，幾乎無法勝過外省作家在寫作上具備之題材掌握優勢。另外，戰後初期戒嚴體制下，文學生產場域受到權力場域嚴格支配及限制——1949 年由胡適發起並由雷震接手主編、其中擁有文藝專欄的《自由中國》於 1960 年被迫停刊；1963 年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因諷刺詩事件被迫離職；1957 年文星書店所創辦之《文星》雜誌於 1966 年遭官方查禁、封刊。眾多自由派作家、評論家在黨國體制下的掙扎與失敗，都屬明顯例證。

³ 鳳兮自 1948 年來台後擔任《台灣新生報》副刊主編兼主筆，並積極倡導戰鬥文藝，影響往後反共文學風潮之發展。

⁴ 張道藩時為國民黨重要幹部之一，且於文藝界各項組織工作著力甚深，其影響力跨足電影、廣播、報業（於 1950 年同時擔任中央電影企業公司、中國廣播公司及中華日報董事長），並主持「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及「中國文藝協會」之成立及創辦《文藝創作》文學雜誌。

⁵ 王平陵來台後於 1950 年代曾任《中國文藝》月刊主編及《文藝創作》主編。

⁶ 王藍來台後曾任國大代表及「中國文藝協會」創會理事，並於 1950 年代擔任當時知名文藝刊物《文壇》社長。

⁷ 陳紀滢來台時為立法委員，和張道藩於 1950 年一同創立「中國文藝協會」，並且擔任常任理事達 25 年，為實質領導人之一（簡弘毅，2003）。

⁸ 上述來台作家生平資訊，除陳紀滢外，皆參照自國立臺灣文學館線上資料平台《台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統整之第二手史料資訊。

至此，戰後初期由外部權力場域所支配的文學生產場域便大致成形。但在如此困境裡，仍存有小部分生產場域縫隙，使尚無能力集結的本省作家得以潛伏文壇之中，並未完全斷絕其累積創作資本的機會。

（二）支配下的空隙——追求文藝的副刊空間

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到『聯副』的面貌突然改變了。它似乎少了些八股味、宣傳味、人情味，而多出來的都是文學味、藝術味。一個個陌生的名字在那兒出現，一篇篇不同以往常見的那種作品在那兒刊露出來。我覺得自己置身其中的迷局，從此也漸漸有了較明確的方向。也許也應該向這塊園地進攻才是吧。（鍾肇政，1981.09.14）

本文前述提到，國家文藝政策箝制下，仍有許多自由派作家在各種領域裡，嘗試迂迴的突破，早期有關 1950 年代以降台灣自由派作家對於官方政策反動的考察，評論家及研究者如葉石濤（1987）、彭瑞金（1991）往往將關注面向聚焦於少數學院派人士行動上，且分析場域也多侷限在雜誌類刊物方面。⁹然則自由派作家其實四散至各類型領域當中，嘗試開展更加多元的藝文創作／編採進路，其中又屬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報》副刊最具有大眾文化場域中的影響力（施英美，2002：4）。¹⁰

實則具有「半山」¹¹身分的林海音，出生在日本，父母為閩客通婚，又於北京生活至戰後才回台，其從小便在多元語言環境中成長，既通曉客語、閩南語，也熟稔於中文會話與書寫。因此戰後語言政策夕變的環境對她而言並未造成太大困擾。另外，除了具備文學鑑賞能力、寫作素養外，社交網絡的通達——曾居北京的台籍菁英社群、丈夫出身於名門家族等——也使林海音得以在戰後文壇站穩根基，快速爬升至主流大報副刊編輯地位（朱宥勳，2021：99-103），成為權力場域與文學生產場域間的中介者。

林海音與聶華苓兩位報刊編輯的存在，不僅使女性作家的能見度提升，而且也使反共文學的風氣漸漸受到扭轉。其中，以林海音的貢獻尤為顯著……台灣報紙能夠出現純文學式的副刊，當始自林海音。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長達十年間，各種不同文學作品都在聯合副刊發表。（陳芳明，2001：175-177）

⁹ 如《自由中國》、《文學雜誌》、《文星》、《筆匯》等雜誌。

¹⁰ 從林海音來台後早年投身的創作平台與作家社群互動歷程來看，無論是積極參與《自由中國》文藝版、《文學雜誌》的創作投稿，抑或是在聶華苓所主導的「春臺小集」聚會中身為核心與會者，皆顯示了他確實歸屬於自由派文藝陣營一員，且其部分作品的思想內涵也展現出高度人文關懷，提倡女性自主精神（施英美，2002：39-45）。

¹¹ 即「半唐山的本省人」，意指在日治時期主要旅居於中國大陸，並於戰後返台的台籍人士。

林海音擔任主編後，一改過往《聯合報》副刊（以下簡稱《聯副》）綜藝風氣，增闢各類型文學專欄，並開展了本省作家、女性作家、現代主義作家及軍中作家等四大文藝路線（陳芳明，2001），廣納各路作家投稿。

正是在此時，《聯副》開始提供資源，扶植非主流的台籍／本省作家——除了使部分戰前作家如楊逵、吳瀛濤獲得復出主流文壇機會之外，也讓許多初克服轉換書寫困境的戰後第一代本省作家，找到從權力場域壓制下的突圍出口。林海音鼓勵這些創作者重新投入寫作，協助修改其投稿作品不順暢部分並予以刊登（夏祖麗，2000：161），而這些登載文章甚至有部分是他們轉換創作語言後，在主流報章版面的第一篇登稿作品：「幾乎《文友通訊》的成員，鍾肇政、鍾理和、廖清秀、施翠峰都是經由她的推介而第一次與文壇接觸。」（陳芳明，2001：177）例如 1960 年，鍾肇政的經典長篇小說《魯冰花》，便在原先邀約作家的長篇小說連載無法如期出稿之情形下，補上其連載空窗期。

拙作《魯冰花》已於數日前開始在聯副連載。前次去信時，我都還沒打算投出，以為尚須再改，後覺真看不下去，便奮勇於二十四日付郵，孰料甫五日，即行開始刊登，殊屬意外。也許是因為恰好沒有連載作品，於是乎，「來早不如來巧」僥倖採刊了。（鍾肇政致鍾理和書簡，1960 年 4 月 3 日；轉引自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1998：282）

在林海音主編《聯副》的約莫十年期間（1953 年 11 月至 1963 年 4 月），不僅是戰後第一代本省作家，能夠較流利運用中文寫作的第二代本省作家（如七等生、黃春明、鄭清文等人）於出道期也受到了《聯副》資源的培育（七等生，1984：274；黃春明，1984：269-271；鄭清文，1984：273-274）。而本省籍作家如鍾肇政，在逐漸站穩文學場域位置、擁有足夠資源鞏固社群網絡後，也依循著類似《聯副》培養新秀的模式，進一步扶植新興作家團隊（朱宥勳，2021：42-43）。¹²

除此之外，由 1947 年時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李萬居所另創之民營大報《公論報》，雖然市場影響力較其他官／黨營媒體為小，且同樣受制於權力場域支配，卻在副刊經營策略上有較多自由空間，因此 1950 年代以降也成為本省作家突破結構限制的機會所在。¹³在 1950-1961 年之間，《公論報》副刊專欄即多次刊登本省作家作品——經

¹² 舉例來說，鍾肇政於 1978 年接任《民眾日報》副刊主編後，同樣採取將刊物版面作為培育新秀之手段，從而建立起一班日漸穩固的作家隊伍。

¹³ 國民黨於 1947 年為加強管控《台灣新生報》而推動內部組改，除了引入總經理制度外，也將原先擔任該報社長的李萬居升任為董事長，藉由「明升暗降」來架空其領導權，使得李決心另創《公論報》（張俐璇，2021；陳玉慶，2007.06.13）。

陳明成（2014）細心考證，即發現葉石濤¹⁴、林亨泰、林鍾隆、吳瀛濤、陳火泉、施翠峰及李榮春曾投稿於《日月潭》，而在《小朋友園地》也有林鍾隆、張良澤、江上及黃娟的身影；至於《藍星週刊》版面上所出現的台籍、本省詩人則有白萩、林宗源、吳瀛濤、陳千武、李魁賢、趙天儀等人。此外，經本研究再行查證，文心（自 1950 年起）、廖清秀（自 1953 年起）的文章也出現於《日月潭》當中。

上述這些本省作家通常是在王鼎鈞擔任編輯時（1953-1955）獲得更多機會登上版面，¹⁵且應是依據林海音所提供的作家名單所邀稿而來。

我在代編期間，已知《日月潭》嚴重缺稿，我想起努力寫作逐漸得名的本省籍作家，他們也許念鄉土之誼「捐」出幾篇稿子。我從林海音女士處討來一份名單，以蕭鐵的名義發出約稿信，廖清秀寄來散文和短篇小說，還寄來悼念蕭鐵的文章，非常難得！（王鼎鈞，2007.05.11）

總結上述，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創作題材高度受限的主流文學環境中，支持這些本省創作者的，不只是仰賴往後《台灣文藝》、《笠詩刊》等作家社群團體在文學場域所建立的結構位置（況在意識型態先行的文壇下，這些位處邊緣、刊物發行量極小的文學團體影響力仍十分有限）；由於主流文壇中擁有像《聯合報》副刊、《公論報》副刊這類較不受官方意識型態所左右的報章出版空間，本省作家得以換取更多文壇能見度與最實際的經濟生存資源。

三、本省作家自組平台的運作

（一）《文友通訊》——夾縫求生、相互砥礪

今年三月間，弟以一偶然機緣，與廖清秀先生開始通信，約略得悉我們台籍青年在今日中國文壇所處的境地。當時，弟即深切感覺到，我們這幾位少數人應經常連絡，俾能在寫作上收到切磋琢磨的功效，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鍾肇政致

¹⁴ 葉石濤早自 1948 年即開始投稿於《日月潭》，而在其出獄後的「創作空白期」也曾於 1955 年以其作品中角色「羅桑榮」為筆名在此發表過一篇散文（陳明成，2014：104-105）。

¹⁵ 原《日月潭》副刊編輯蕭鐵於 1953 年 4 月因病住院，並委託王鼎鈞代理副刊編輯工作。直至其去世後，王才正式接任編輯。因此本文即以實際接任工作時間點來標註王鼎鈞的任職年份（王鼎鈞，2007.05.10，2007.05.11）。

鍾理和書簡，1957 年 4 月 23 日；轉引自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1998：23）

經歷語言轉換期以後，少部分台灣本省籍創作者決議以團結合作取代單打獨鬥，首先由鍾肇政於 1957 年發起《文友通訊》此一小型油印刊物，集結陳火泉、廖清秀、鍾肇政、鍾理和、李榮春、施翠峰、文心（許炳成）等¹⁶戰後第一代本省作家，並多由鍾肇政擔任刊物運作核心，定期刊登同仁已發表之作品供成員評閱、分享徵文訊息及成員的動態。這些創作者並未在美學規範受到威權高度制約的結構困境中全盤放棄，反而在文學場域邊緣，經由共同研擬投稿策略與團體行動方式，試圖在文學場域中佔位。例如鍾肇政與其他作家在通信中曾反覆提及關於搶攻地盤的「陣地」概念（朱宥勳，2021：40-41）。

目前《魯》作每天刊得很多，約有千五字……可能提前結束，大概六月中旬前後便可完，因此你目前打算寫的，最好早些下手，務必於六月上旬中寄來，不過算起來也還有一個月半的功夫，足夠你構成一部好作品的，不是嗎？我還想鼓勵文心也寫個長些的作品，緊緊釘上去，如果我們能夠霸佔這個地盤，豈不妙哉。（鍾肇政致鍾理和書簡，1960 年 4 月 13 日；轉引自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1998：287）

「陣地」觀念正是在創作者間分享投稿資訊、互相串聯的基礎中建立的：通訊成員積極投稿，並集體計畫性地爭取同一版面。且嘗試刊物種類多元，從《公論報》、《中華日報》、《聯合報》等主流報章副刊到《自由談》、《自由中國》、《文星》雜誌等，皆偶有這群創作者的零星身影。而鍾肇政、廖清秀等人作品也曾刊登於官方經營的《文藝創作》月刊中；¹⁷更甚者，這些本省作家也嘗試向外拓展，挑戰從海外「反攻」文壇。

春節前接得清秀兄來信，提及《香港亞洲畫報》公開徵求四萬字中篇稿事，問我意思如何，他似乎有意參加。中篇較易為力，我很想試試……若得兄也寫篇參加，豈不更為熱鬧？（鍾理和致鍾肇政書簡，1958 年 2 月 24 日；轉引自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1998：85）

亞洲徵求中篇，我極願一試，目前寫作中的中篇恰亦四萬字，看情形……清秀兄尚未對我有任何表示，相信他也是樂於一試的。還有我也去信邀請一起參加（盼兄向文心去信打氣，他近陷憂鬱，已二月之久未寫隻字了），同攻海外領域，縱

¹⁶ 後於第五次及第七次通訊分別加入楊紫江、許山木兩人。

¹⁷ 這些投稿紀錄皆考證自國立臺灣文學館所統整之《台灣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庫》二手資訊。

使只有一位攻進，對我們也是一種榮譽……目前自由談彭歌來信，偶談起這次徵文事，……他還要我們多向海外刊物投稿，台灣文壇受人霸佔的成分較多，也許這是他有感而發的，不管如何，台灣既乏出路，我們向海外發展，未始不是妙策，兄以為然嗎？（鍾肇政致鍾理和書簡，1958年3月5日；轉引自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1998：88-89）

雖然《文友通訊》只維持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且於刊物發表的意見僅能在社群成員間落實，但此舉係戰後首次有本省作家組成聯誼性通訊媒介，而編輯、傳閱刊物過程也凝聚起他們的集體認同。

但另一方面，《文友通訊》無法繼續運作的原因，也在於其內部多數成員終究很難在文學場域中順利站穩腳步——真正影響這群本省籍作家能否佔位的關鍵因素，不單是有無掌握文學場域中的主流支配規律（如中文寫作、作品題材等）而已，還需要更廣泛的社會網絡資源才可以幫助個人取得成功（張誦聖，2011：33）。而對於受限自當時主流文學揀選機制的本省創作者來說，這種資源往往是他們所最缺乏的。

即便如此，在《文友通訊》停辦後，過往成員（如鍾肇政與鍾理和之間）仍秉持「陣地」精神，時常交換投稿訊息、互相支持。這一股將作家群聚的力量，往後也轉向至日治時期前輩吳濁流所發起的《台灣文藝》，同時揭示著1960年代台籍／本省籍作家企圖開展另一條生存路徑——不願受到主流文藝體制束縛，決定自行組織同仁雜誌刊物，並串連起自力維生的非主流作家社群網絡。

（二）《台灣文藝》及《笠詩刊》——建置社群、獎掖後進

1964年4月，為求對抗反共「口號」文學，並擺脫當時文壇蔚為風潮的西方現代文學風氣，繼承日治時期以降台灣新文學傳統，吳濁流首先獨資創辦《台灣文藝》，自此引領戰後本省籍作家群體進入較具系統性之社群建置及人才培育階段。不僅使戰前作家如吳新榮、楊逵、龍瑛宗、葉石濤等人有機會重歸文壇活動，刊物也邀集了戰後作家如鍾肇政、廖清秀、鄭清文、趙天儀等人一同加入編輯行列，以期貫徹創刊宗旨：「本刊的園地提供青年作家耕耘，以期在文藝界培養新的幼苗，進而使其茁長綠化。」（吳濁流著、張良澤編，1977：41）《台灣文藝》邀稿文體主要有小說、詩（漢詩、新詩）、散文、評論等，且除了少數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篇幅外，更多是描寫在地歷史、情感的台灣本土文學作品及相關評論（褚昱志，1993），本地色彩十分濃厚。而在第五期以後刊物也開始提供稿費。

從吳濁流推廣理念時的書信談話及文章當中，可看見新興文學流派試圖鞏固場域自主權、建構另一限量生產的次級場域（the sub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的現象：刊物以回歸「文藝的純粹」、拒斥官方權力支配或是商業考量為其號召手段。

魏兄（按：應是魏清德）今天來北。我把不能變更的理由詳細地告訴他，讓他了解。也就是說，今後我的方針絕對不會改變。總之，這是為了台灣文學，而跟其他一切事情無關。我們的雜誌是同仁雜誌，而目的並不在於賺錢。我們是要給年輕的台灣籍作家提供一些寫作的空間為目的的。（吳濁流致鍾肇政書信內容，1964 年 2 月 21 日；轉引自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2000：84）

文學……不能拿來做工具，無論是商業上，抑是政治上或其他都不行。如果拿來做工具的話，一定影響到文學本身的生命……《台灣文藝》自創辦以來，很多有心人勸導我，七分文藝三分買賣，或是五分文藝五分買賣……當然屢試屢敗，最後只好退縮，但愛護我者不斷地慫恿我商品化，我表面上雖不便反駁，可是在內心自言自語：「如果商品化，我的使命也完了，又何必我來辦呢？」（吳濁流著、張良澤編，1977：43-44）¹⁸

除創刊初期即和陳映真（陳永善）、鄭煥（鄭煥生）、江上（江文雙）、張良澤等後輩作家有所連繫以外（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2000：86），自 1965 年開始，《台灣文藝》也設立當時文壇唯一的本土文學獎「台灣文學獎」，¹⁹每年頒發「正獎」、「佳作」獎項及獎金，藉此鼓勵優秀青年作家持續創作。基於刊物稿費、競賽獎金等資源條件以及積極的社會互動關係下，《台灣文藝》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對位處文學場域邊緣的新興本省作家其實發揮一定程度的社群支持作用。²⁰

從 1966 年至 1976 年《台灣文藝》所舉辦之台灣（吳濁流）文學獎得獎名單當中，可見到新銳本省作家的現身，尤以小說獎項更具代表性，許多獲獎人皆為日後享譽文壇者，如小說正獎得獎者李喬、鄭清文與楊青矗，以及小說佳作獎的七等生、黃春明、洪醒夫（早期筆名為司徒門）、喬幸嘉及周梅春等人。²¹

¹⁸ 原文發表於 1966 年《台灣文藝》第 11 期。

¹⁹ 自 1970 年起更名為吳濁流文學獎。

²⁰ 由於最初時常發生稿荒，《台灣文藝》編輯群非常積極與青年作家、文評家互動、邀稿，除鍾鐵民為鍾理和之子，與社群原先即有較高程度互動外，從現有書信可注意到 1960 年代初期有林鍾隆、陳映真、李喬、張良澤、黃娟、黃春明等人受到特別關注，也數次出現於作家實體聚會中。

²¹ 得獎名單詳見本文附錄。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社群結構背後調動的網絡資源，不僅限於文壇人士，也有許多台灣本省仕紳參與其中。最早擔任名譽社長者即為醫界出身之徐傍興，而吳濁流在刊物籌備期間也曾與非藝文界人士舉辦座談會，以期打通政商關係，確保刊物未來能順利營運。1964年2月22日於台北市台灣省工業會舉辦之座談會當日，出席者計有20人，除王詩琅為戰前藝文界人士，林衡道同時具備作家身分及其中兩人年少時也曾發表過小說之外，²²多數與會人士與當時文藝界淵源並不深（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2000：84-85）。

表一 1964年2月22日台灣文藝座談會出席者名單

領域	出席者
醫界	徐傍興
政界	吳三連、朱盛淇、陳逸松、徐慶鐘、林挺生
教育界	林攀龍、朱昭陽、林佛樹、林衡道
工商界	黃登洲、葉榮鐘、李君晰、顏朝邦、辜偉甫
藝文界	吳濁流、王詩琅
不明	蕭家棟 ²³ 、李沛霖 ²⁴ 、陳秋子

（資料來源：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2000：84；張金墻，1997：156；作者自行製表）

而在這些社會賢達當中，吳三連、葉榮鐘、徐慶鐘、顏朝邦、李君晰等五人也於往後成為第五期《台灣文藝》發起人，²⁵並招募各界以一股一千元捐款方式籌措刊物資金，致使其得以支撐過草創時期（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2000：107-108）。至於長期穩定資助刊物者則為吳三連及林挺生（其經營之大同公司也時常提供產品做為台灣文學獎獲獎獎品）。

²² 吳濁流在書信中並未說明另兩位曾發表小說的與會者為何，因此僅能就這20位本省籍人士各自出身經歷的考察，來推斷其可能指涉對象為陳逸松及李君晰——陳逸松於日治時期曾投入文藝活動，並著有一篇名為《八姊妹》的小說作品（王昶雄，1997：11）；李君晰自日治時期即熱中於文藝及翻譯中國文史研究作品，也曾擔任《台灣文藝》有獎徵文比賽的小說組評審，因此推測其曾有過小說創作經驗（巫永福，2003：77；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2000：108）。

²³ 相近時期同名者為日治時期台中仕紳蕭敦仁之子，就讀早稻田大學法學部並於1937年畢業，但未有確切資訊能證實為同一人（興南新聞社，1943：199；紀旭峰，2013：147-183）。

²⁴ 疑似為就讀日治時期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校（今台北市立成功高中）時因密謀反抗而於1936年遭日警逮捕之李沛霖。戰後經營書籍進口事業，又因1976年三省書店案再次入獄（藍博洲，1991，1993）。但本研究尚未能找到可證實為同一人之確切資訊。

²⁵ 第五期發起人當中除有參與座談會之四人外，尚有如下所述三人：知名戰前台籍仕紳、時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楊肇嘉；板橋林本源家族出身之林宗毅博士；日治時期新竹州議員邱雲興之子、時任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的邱仕榮醫師。

除了《台灣文藝》外，也有由詹冰（詹益川）、林亨泰、吳瀛濤、陳千武、趙天儀、杜國清、白萩（何錦榮）、錦連（陳金連）、古貝、王憲陽、黃荷生等台籍詩人所發起的本土詩歌創作發表平台，與前者合譽為戰後本省作家文壇兩支柱之一的《笠詩刊》。在參與《台灣文藝》籌備會後，部分新詩創作者有感於吳濁流等人所主張之月刊內容似乎過分偏重於小說、隨筆及漢詩等作品類型，遂決定另行設立同仁詩刊（陳千武，2004：48）。1964 年 6 月，《笠詩刊》出版，版面聚集各式本省詩人作品，並提倡以現代文藝結合寫實、鄉土精神進行創作。²⁶

類似於《台灣文藝》促成跨世代社群整合的發展情況，藉助笠詩社的運作，讓戰前一代台籍詩人有了回歸創作社群的機會，除發起人林亨泰及詹冰之外，尚有巫永福及張彥勳等人重新投入文壇活動；至於積極參與之戰後第二代詩人則有李魁賢、趙天儀、杜國清、白萩等人。另外，在輸入外國文學作品都十分不易的戒嚴體制下，由於《笠詩刊》當中許多成員處於「二言使用狀態」（Bilingualism），創作得以運用兩種不同語言書寫（向陽，2007：56），所以他們不但能以譯介日本文壇詩論及作品的方式來引介國外文壇資訊，更將其創作觸角伸及海外，拓展作家的生存空間，例如陳千武曾寄贈《笠詩刊》至日本各圖書文庫，開啟與日本詩壇交流契機，更將同仁作品轉譯為日文逆向輸出（阮美慧，2005）。

總體來說，從上述作家社群的發展歷程可發現，本省籍作家仍於文學生產場域縫隙中盡力集結：除了集體研擬寫作技巧、投稿策略外，也嘗試自造刊物園地以維繫、提升社群創作能量。換言之，既有社會網絡既未完全斷絕，還能逐步擴張為跨世代社群結構——1950 年代從事「陣地戰」的戰後第一代作家，在 1960 年代開始與戰前作家共同投入文學刊物經營、開拓海外能見度，並網羅、發掘戰後第二代作家群體，而不同類型刊物間主力成員也多有重疊，逐漸形成一龐大本省作家社群結構。更重要的是，雖然《台灣文藝》、《笠詩刊》這兩個平台其實長期位處市場邊緣（資源有限且流通量不大），更多程度屬於同仁交流刊物，²⁷我們仍可以在此一跨世代網絡建置歷程中注意到台籍人士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運作情形，如此才得以讓組織者一定程度擺脫權力場域制約，有效維持作家社群結構之集結與存續。

²⁶ 需特別說明，不同於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當中討論的「鄉土」精神，笠詩社成員所提倡的鄉土精神並未涉及太多社會、政治意涵（巫永福，1978：43）。

²⁷ 對於 1950-1960 年代台灣文壇生態變化之考察著力甚深的應鳳凰（2007：147）即指出，從戰後整體文藝雜誌史角度觀之，台灣本土作家社群的總體資源條件最差，起步也最晚，且無論在政治、經濟或語言運用方面都屬於文壇當中最弱勢者。

四、鄉土文學論戰之前——作家班底與社群結構的形成

（一）作家班底雛形——葉石濤的文評活動

1970年代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為戰後以降台灣文壇首度發生的大規模文化論戰，其序幕被普遍認為是由戰後第二代本省作家王拓於1977年4月號《仙人掌雜誌》發表之〈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所意外開啟——其強調文學作品應根植於在地（鄉土）生存環境，展現對社會不公義現象之批判與關懷弱勢的思想精神。爾後，該文隨即引起親國民黨立場者為首之作家群體的激烈批評回應。而同年8月20日，余光中於《聯合報》刊登〈狼來了〉一文，甚至直言台灣鄉土文學即為中國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余光中，1977：24-27），將本次論戰的政治肅殺氣氛帶到最高點，迫使更多本省籍文壇人士深陷論辯中。

總體觀之，積極參與鄉土文學論戰者，主力實為戰後第二代本省作家社群：除了王拓，與第一代本省作家社群有較多互動的則屬黃春明及陳映真。但是在這場文壇交鋒裡，積極投入論戰的戰前世代台籍作家，葉石濤本身的意識形態立場，與其在鄉土論戰前後數年間的行動歷程也值得多加留意，並據此可觀察到其背後隱約浮現的台灣本省籍作家整體性社群想像。

葉石濤早於大規模的鄉土文學論戰正式爆發前十數年便已醞釀鄉土文學議題之討論。1965年，甫復出文壇的葉石濤投入文學場域「評論者」角色，並且於《文星》雜誌發表了〈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

打從我會寫幾篇像樣的文章開始，我的心裏始終存着一個熾烈的願望：這個願望說起來頗不簡單……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鄉土文學史。（葉石濤，1965：70）

接著在論戰正酣之時，葉石濤也於1977年5月發表了論述觀點基進，就連同為「捍衛鄉土文學」陣營的陳映真（許南村，1978：93-99）²⁸也曾撰文批評其中立場有分離主義成分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²⁹

²⁸ 陳映真撰寫該文所使用之筆名為許南村。

²⁹ 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反官方意識型態的陣營實際上在立場上具有歧異性，由於當時仍屬戒嚴政治環境，知識份子也極力避免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言論浮出檯面，「『本土』這個認知仍然隱約之間側身於『中國』符號之下，尚未正式浮顯為一種抗爭場域」（陳明成，2002：121）。

儘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那便是臺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臺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他應該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上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儘管臺灣作家作品的題材是自由的、毫無限制的，作家可以自由地寫出任何他們感興趣及喜愛的事物，可是他們應具有根深蒂固的『臺灣意識』，否則臺灣鄉土文學豈不成為某種「流亡文學」？（葉石濤，1978：72）

沿著葉石濤一系列文章理路推進，便得以判斷其長期擁有一整體性作家社群想像——尤其聚焦在省籍身分辨識及本土文學意識形態方面。自 1960 年代中期起，葉石濤即基於其文學史觀，開始撰寫大量文章集中評論台籍作家，並致力於區分寫作類型分野。1973 年出版《葉石濤作家論集》，包含吳濁流、鍾肇政、鍾理和、林海音、李喬、七等生、鄭清文及林懷民等跨世代台灣本省籍作家皆在其專文評論的行列中。

最後，當具有共同體（本省籍作家）想像的創作者、社群出版平台及評論家等文學生產場域角色逐一到位時，作家「班底」（Equipe）概念雛形於焉誕生。辨識「班底」的重要性，在於能更加清晰地觀察到一連串篩選機制下，最終嶄露頭角的人文圈成員有哪些人——通過編輯或刊物主持人（如林海音、鍾肇政、吳濁流等）審核、文評（葉石濤）認可等揀選文壇入場者關卡以後，作家在次級生產場域內的社群象徵地位將有所提升，並得以取得更多作品發表資源和輿論影響力，從而也證實個人外部有一內聚性作家社群結構存在。

（二）本省籍作家的社群結構

承上述，本研究將以社會網絡圖像呈現台灣本省籍作家間社會互動關係，以證明戰後至 1973 年《葉石濤作家論集》出版、本省籍作家班底概念在行動者論述實作過程中逐漸浮現時，這些橫跨世代的作家群體，確實已建立起具有省籍意識型態同質性的整體社群結構。

然而，除了作家之間書信內容或是團體會議紀錄等取得難度較高的第一手文本外，如何利用規模較為龐大的文本資料來證成具體社會互動關係存在，實屬一大難題，所幸雜誌刊物營運者（如發行人、社長、編輯、顧問等）名單及撰稿人紀錄或許也能成為具備解釋效力的分析文本——例如部分學者在針對台灣戒嚴時期黨外政論雜誌發展的研究發現，由於政府禁止登記新報，也嚴格審查廣播媒體內容，因此運作所需經費較少、篇幅不受控管，且未有太多創辦人資格限制的雜誌刊物，相對而言成為從事組織動員成本較低、較具彈性的媒介工具之一（Berman 著、李連江譯，1995：288-310）。以 1979

年《美麗島》雜誌社為例，即可注意到政治反對運動者能利用刊物社團借殼從事組織工作——幾乎所有相近政治意識形態的黨外人士都掛名在社務委員名單上，並積極參與、舉辦聯誼會活動（王甫昌，1996：151-153）。此也證實黨國政府在面對雜誌刊物時，明顯存在部分治理縫隙，使得行動者能經由社務相關活動發展出具有一定品質的社會連帶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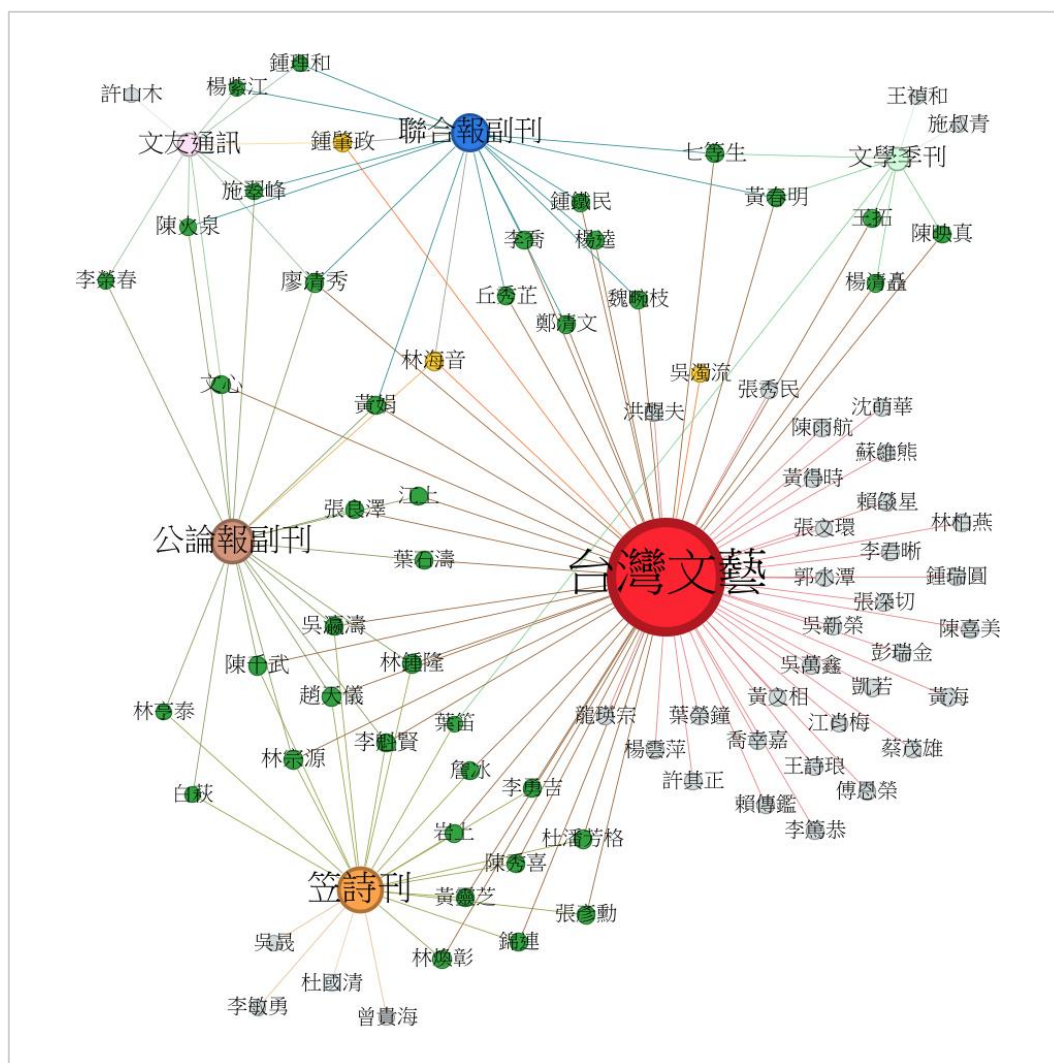
既然在管制嚴格、人身風險更高的政治場域，都可經由雜誌刊物組職名單、撰稿紀錄有效觀察具體社會互動關係存在，那麼我們便得以推測，在這之前多數僅有省籍與寫作風格同質性、相對不碰觸過多敏感議題的本省作家群體，應有更多可供蒐集，且足夠有效推斷其具備實際社會互動關係的刊物活動紀錄。

因此，除了前面所提及的書信史料外，我也將考察各項刊物投稿及相關活動（例如參與座談會、擔任文學獎管理委員／評審等）紀錄，藉以釐清本省作家的社會網絡樣貌，並依據各行動者投稿刊物（參與團體）重疊性，來搜尋社群內部是否有彼此關係更密切的次級群體，以判定社群資源大多是由哪些行動者所繼承。

首先是針對 1950 年至 1973 年（即《葉石濤作家論集》之出版年）整體社群結構的分析。³⁰實際上，投入往後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的關鍵行動者，多屬戰後第二代本省作家，包含王拓、陳映真、楊青矗等人。論戰以前，他們主要活動集結在由外省籍文學評論家尉天驄所主編的《文學季刊》（以下簡稱文季）中。誠如蕭阿勤（2012：169）指出，1970 年代中期的這些鄉土文學青年作家與前一代少有互動，且在創作內涵上也已不同於過去的殖民地文學傳統，但就本文觀點認為，在整個文學場域中，各式不同類型的行動角色（主編、刊物、文評家）於鄉土文學論戰發生之前，究竟有無共同促成一個具備高度同質性的作家班底及社會關係網絡，才是判定社會互動程度強弱的重點所在。

這些年輕的鄉土文學作家看似與戰後第一代台籍作家分屬不同社群，然而，當我們仔細檢視後，就會發現許多創作者所參與活動的團體、投稿平台實際上有高度重疊情形，如圖二所示。

³⁰ 但在《聯副》部分僅計入林海音擔任編輯（純文藝路線）時本省作家投稿紀錄，以確保網絡圖像能針對省籍群體社會互動關係具有解釋效力，至於《公論報》副刊的投稿紀錄則計自 1950 年至 1961 年李萬居轉讓報社經營權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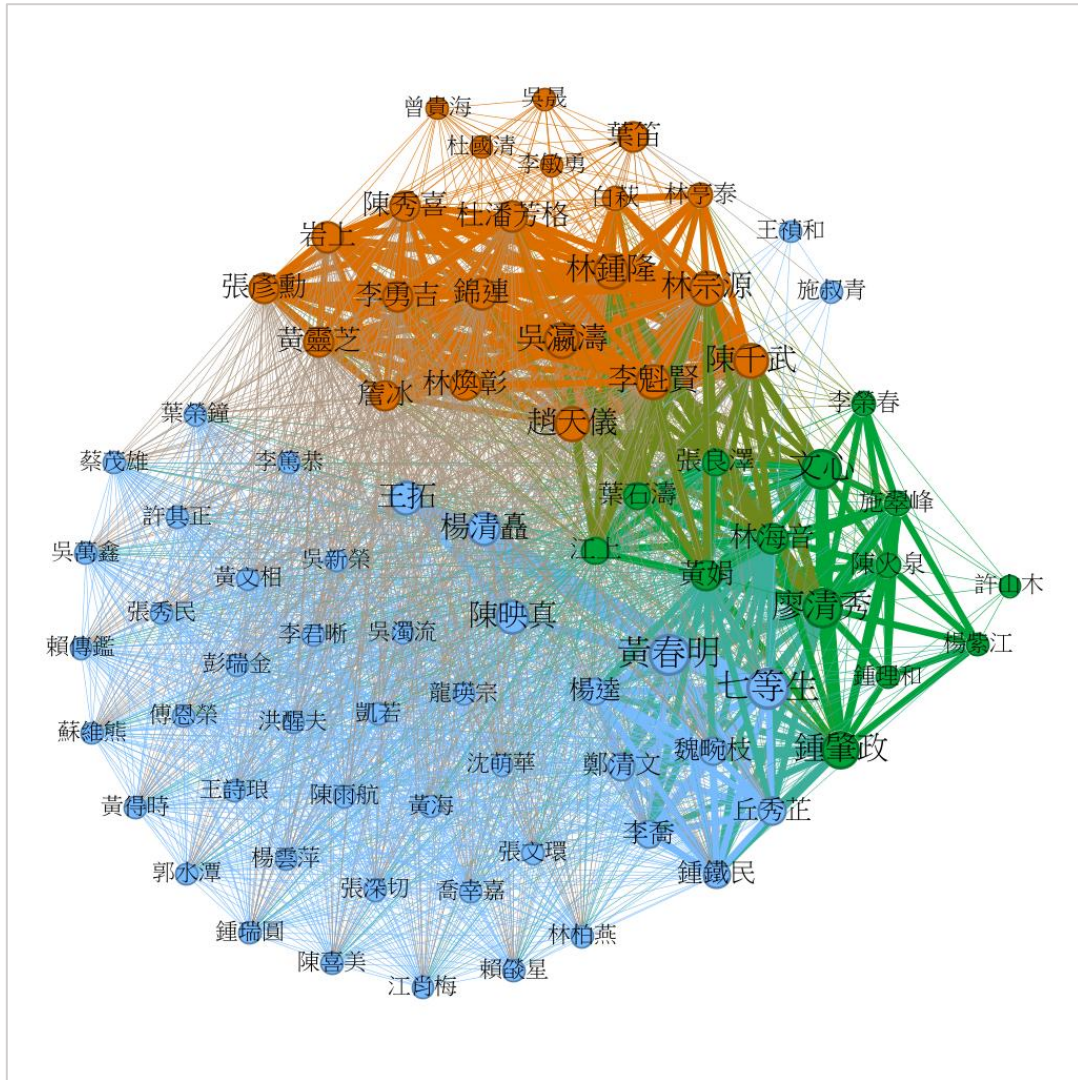
圖二 1950-1973 年「作家——刊物／團體」活動關係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圖二當中依節點顏色將行動者作如下區分：灰色為僅有單一刊物／團體活動之作家；綠色是兩種以上刊物／團體活動之作家；黃色則為刊物團體重要發起人或主流報章版面編輯。³¹總體而言，圖中有半數以上本省作家皆活動於兩項以上的出版平台／刊物團體，但由於這樣的「作家——刊物／團體」二模網絡（2 mode-network）尚不能更有效釐清行動者間社會互動密切程度，因此我將另外計算他們參與投稿、從事文評活動的刊物團體／出版平台的重疊數量，並整合為本省作家社會互動關係網絡（1 mode-network）。

³¹ 《笠詩刊》為詩社成員共同經營的刊物，與特定寡頭號召核心成員參與工作的運作模式較為不同，故未標記重要發起人或主要編輯者。

下圖三即為 1950-1973 年本省作家整體社會互動關係網絡，並根據模組性（modularity）³²判別出不同類型活躍群體：淺褐色多為笠詩社成員；綠色則為《文友通訊》成員及林海音編輯《聯副》時發掘之作家群體；藍色群體則為《台灣文藝》行動者及部分《文季》成員。



圖三 1950-1973年台籍作家整體社會互動關係網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圖）

³² 模組性（modularity）為用於判別行動者社群邊界的社會網絡計算指標，假如模組性越高，就代表該社群中節點連結密度越高，並且與其他社群連結密度也較低，藉此便得以進一步區辨不同類型的行動者群體。

從圖三可以發現，無論戰前、戰後第一代及戰後第二代作家，彼此多少都有基礎社會互動關係存在，但的確也可辨識出行動者的社群邊界。圖中節點之間連線粗細所代表的是兩位行動者之間共同活躍的團體／平台數量多寡，藉此判斷他們的社會關係親近性。就 1970 年代初期以前觀察，多數戰後第一代、第二代小說創作者聚集在林海音、鍾肇政及廖清秀所處之網絡當中；至於《台灣文藝》的作家群體，其網絡邊界則相對沒那麼明顯，且連結到的青年作家也多活躍於兩個以上的團體／出版平台；而《笠詩刊》核心成員之間的社會互動緊密度則明顯高於其他集群。

而除了經由統計分析技術辨識網絡內集群分佈，在觀察社會網絡分布圖像時，我們也能注意到林海音位於各集群間交界處位置，由此可知許多不同集群行動者皆與她形成連線關係，足以解釋其作為文學場域中介者角色所促成的人群吸納效果。

總體來說，林海音在網絡中處於「橋」（bridge）的位置，並且帶動起行動者串連過程：首先是《文友通訊》成員在經由鍾肇政傳遞訊息後，開始集體向林海音擔任主編的《聯合報》副刊投稿，而身為中介者角色（總編輯）的她則在審稿過程中發掘這群第一代本省作家，並且將這些新秀介紹給其他版面的編輯同仁（如《公論報》的王鼎鈞），讓他們得以突破結構限制，獲得與主流文壇接觸的機會；另外，林海音也藉助副刊版面資源培植了部分第二代本省作家，累積起新興創作者的文壇能見度。從而我們便可清楚得知團體、報刊當中行動者之間頻繁的互動關係。

然而，值得另外討論的作家集群為圖三左下角的《文季》成員群體。事實上，他們的社會網絡圖像限制正反映了本文僅以個人參與投稿／團體活動紀錄判別社會關係，可能導致的分析不足之處。舉陳映真、七等生及王拓為例，若只以表面的投稿活動來判斷他們與其他作家的社會互動關係，則容易忽略掉這層社交關係背後更深遠之互動脈絡。

陳映真雖於 1960 年代初期與鍾肇政、林海音有密切聯繫，並且曾參與《台灣文藝》草創期的部分活動，然而往後因國族身份認同問題——即使其當時同樣認知自己為台籍作家，但反感於刊物名稱「背後隱含狹隘的地方主義」——決心刻意與其他本省籍作家保持距離，不願供稿予刊物，也堅持拒絕鍾肇政將其作品納入 1965 年的「台灣省籍作家叢書」出版計畫；如此立場差異也展現在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期，他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觀點，針對同為台籍人士並支持鄉土陣營的葉石濤是否具有「分離主義」思想所提出之質疑論述當中（即便陳映真的評論是由《台灣文藝》所刊登）。

而七等生最早雖屬《文季》成員，卻因理念不合而於 1967 年末淡出團體（陳明成，2013：176-244）；另一方面，王拓雖然主要活躍於 1973 年復刊時的《文季》，然而其

出道時期的文學活動歷程，卻多是透過上一世代本省作家主持的刊物平台發表作品：1970年在林海音主持的《純文學》發表第一篇小說作品〈吊人樹〉，並於1971年投稿短篇小說〈海葬〉至《台灣文藝》。由此可見其和前一代作家的社會距離並未如此遙遠。

總體來說，雖然有少數異例存在，但並不會過分影響社會網絡分析的解釋效度，因為回到社會互動關係網絡圖像，尤其是經由本省籍作家運作出版平台以後，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一個社交關係頻繁、擁有一定程度跨集群／跨世代互動關係的整體作家社群結構已然現身。

五、 結論

本文嘗試以整體性角度考察，加以解釋戰後台灣本省籍作家如何能逐步克服各種結構限制，於二十多年內建立起整體社群結構，培養往後可能挑戰權力場域的作家能量。

運用整體性觀點爬梳歷史過程，我們的確能看出一連串的行動者、團體並非各自分裂運作的，以《文友通訊》和《聯副》的串連關係為例，單一作家於同時期活躍在不同組織網絡、出版平台上，並藉由集體行動促成連鎖效應以突破僵局。而場域之間也會彼此牽引，使影響因子更趨複雜，例如營運《台灣文藝》過程當中，並不只是由作家團體自行投入資源，還有來自政治權力場域的本省籍士紳擔任共同發行人、協力籌募和贊助資金，而這些人脈或可間接幫助刊物降低政治打壓風險。另外，也必須搭配文學生產場域的中介者（如副刊編輯）以更加多元的徵稿路線突破了權力場域限制，才能開創非主流作家脫離弱勢處境的機會。

總結上述，本省作家在所有角色位置條件配合之下，初步克服了跨語言書寫與口號文學當道的國家文藝體制困境，不僅在場域縫隙中確立社群結構，也能夠獎掖後進。至於作家「班底」概念定義和社會網絡分析，則有助於辨識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前，跨世代台灣本省籍作家基於相似族群意識型態及社會關係所建立的整體社群結構樣貌。

從主流報章副刊如《聯副》、《公論報》副刊做為突破權力場域支配、使作品能接觸更多讀者的版面，《文友通訊》集結邊緣創作者積極搶攻「陣地」，乃至於《台灣文藝》與《笠詩刊》等刊物提供社群專屬的發表、討論園地及擴展海外交流機會，並進一步發掘新興本省作家，團體之間的社會交流關係實際上環環相扣、相互延伸。而經過戰後初期文學真空期困境，本省作家社群的二十餘年奮力耕耘也取得了初步成果：無論係

文學創作者、文學編輯，乃至於社群陣地及文學評論家，所有在次級場域（本省籍作家文學生產場域）中的行動者角色皆已完成初步佔位。

慚愧之至，除了引入社會網絡技術，本文在歷史脈絡考證方面，實有許多部分為既有研究成果的統整，藉以側繪出整體場域結構之樣貌。對此不僅深感僥倖，也要向所有前行研究者致上萬分謝意。而在全文所提到的文學團體、行動者之外，仍有許多在當時對本省籍作家具影響力的文壇行動者、報刊（例如童尚經擔任編輯時期的《台灣新生報》副刊、林海音在 1960 年代主持的《純文學》雜誌等）及團體等未被提及與深入分析，也是本研究未竟之處。

最後，或許提出的結論難免仍有些老調重彈，但本研究企圖以整體性視角考察作家社群結構的終極目標，正是為求進一步促成「除魅」效果——即便特定團體或關鍵行動者的貢獻係無庸置疑，也要適度跳脫個人主義式歌頌，嘗試爬梳社群結構發展、關注整體場域變遷。唯有了解這些行動者所各自扮演的場域角色為何，又是在哪些條件確立下得以發揮能動性（agency）、促成社群支持結構及後進人才誕生，才可能對歷史過程做出更加適切的評價。

引用書目

一、 中文書目

- 七等生，1984，〈輕言〉，收錄於林海音編，《剪影話文壇》，台北：純文學，頁274。
- 王甫昌，1996，〈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第1期，頁129-209。
- 王昶雄，1997，〈序〉，收錄於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台》，台北：前衛，頁11。
- 王鼎鈞，2007.05.10，〈我與公論報 一段因緣（上）〉，《聯合報》，第E7版。
- 王鼎鈞，2007.05.11，〈我與公論報 一段因緣（下）〉，《聯合報》，第E7版。
- 王鼎鈞，2009，《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台北：爾雅。
- 向陽，2007，〈「現代」與「現實」的辯證：論《笠》詩刊本土論述的雙軸延伸〉，《新地文學》，第2期，頁43-63。
- 朱宥勳，2021，《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台北：大塊文化。
- 余光中，1977，〈狼來了〉，收錄於彭品光主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台北：青溪文藝學會，頁24-27。
- 吳介民，2004，〈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收錄於李丁讚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圖書，頁299-355。
- 吳濁流著、張良澤編，1977，《台灣文藝與我》，台北：遠行。
- 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2000，《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台北：九歌。
- 巫永福，1978，〈鄉土與自由——臺灣詩文學的展望〉，《笠》，第87期，頁42-57。
- 巫永福，2003，《我的風霜歲月：巫永福回憶錄》，台北：望春風文化事業。
- 阮美慧，2005，〈陳千武在《笠》發展史上的地位〉，《東海中文學報》，第17期，頁153-179。
- 施英美，2002，〈〈聯合報〉副刊時期（1953-1963）的林海音研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夏祖麗，2000，《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天下文化。
- 張金墻，1997，〈斷裂與再生——《台灣文藝》研究（1964-1994）〉，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張俐璇，2021，〈場域拼圖：《公論報》資料庫與戰後臺灣文學研究〉，《報時光》，<https://time.udn.com/udntime/story/122387/5730520>，瀏覽日期：2022.08.12。

- 張誦聖，2005，〈“文學體制”、“場域觀”、“文學生態”：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幾個新觀念架構〉，《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6 卷 2 期及第 7 卷 1 期，頁 206-217。
- 張誦聖，2011，〈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收錄於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頁 17-38。
- 許南村，1978，〈鄉土文學的盲點〉，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尉天驄（遠流·長橋聯合發行部總經銷），頁 93-99。
- 陳千武，2004，〈笠詩精神堅持四十年〉，《台灣文學館通訊》，第 5 期，頁 48-50。
- 陳玉慶，2007.06.13，〈也慨談《公論報》一段因緣〉，《聯合報》，第 E7 版。
- 陳明成，2002，〈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明成，2013，《陳映真現象：關於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台北：前衛。
- 陳明成，2014，〈祕境與棄兒——初步踏查《公論報》藝文副刊〉，《台灣文學研究》，第 7 期，頁 65-125。
- 陳芳明，2001，〈台灣新文學史系列 五〇年代的文學侷限與突破〉，《聯合文學》，第 200 期，頁 164-177。
- 陳芳明，2011，《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
- 陳建忠，2007，《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圖書。
- 彭瑞金，1991，《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黃春明，1984，〈我滿懷由衷的感激〉，收錄於林海音編，《剪影話文壇》，台北：純文學，頁 269-271。
- 黃惠禎，2016，《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台北：聯經。
- 葉石濤，1965，〈台灣的鄉土文學〉，《文星》，第 97 期，頁 70-73。
- 葉石濤，1973，《葉石濤作家論集》，高雄：三信。
- 葉石濤，1978，〈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尉天驄（遠流·長橋聯合發行部總經銷），頁 69-92。
- 葉石濤，1987，《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 路丹妮、陳正賢，2015，〈台灣戰後初期文學場域重建：數位人文方法的運用與實例分析〉，《台灣文學學報》，第 27 期，頁 153-190。
- 褚昱志，1993，〈吳濁流與《臺灣文藝》〉，《問學集》，第 3 期，頁 153-161。
- 鄭清文，1984，〈滋潤多少文壇新秀種子〉，收錄於林海音編，《剪影話文壇》，台北：純文學，頁 273-274。
- 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

- 應鳳凰，2007，〈文藝雜誌、作家群落與六〇年代台灣文壇〉，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苦悶與蛻變：六〇、七〇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台北：文津，頁 117-152。
-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1998，《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
- 鍾肇政，1981.09.14，〈早期聯副瑣憶〉，《聯合報》，第 8 版。
- 簡弘毅，2003，〈陳紀澄文學與五〇年代反共文藝體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藍博洲，1991，《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
- 藍博洲，1993，《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台北：時報文化。
- Berman, Daniel K. 著、李連江譯，1995，《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台北：時報。
- Bourdieu, Pierre 著、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與結構》，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 Escarpit, Robert 著、葉淑燕譯，1990，《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

二、 日文書目

- 紀旭峰，2013，〈戰前期早稻田大学の台湾人留学生〉，《早稻田大学史記要》，第 44 卷，頁 147-183。
- 興南新聞社，1943，《臺灣人士鑑》，台北：興南新聞社。

三、 英文書目

- Hanneman, Robert A. & Riddle, M. (2005).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Methods*. Riversid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附錄、1966-1976 年台灣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得獎名單

年份	小說正獎	小說佳作	新詩正獎	新詩佳作	漢詩正獎
1966	從缺	七等生（劉武雄）、張彥勳、廖清秀、鍾鐵民、鍾肇政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1967	從缺	七等生（劉武雄）、黃春明、鍾肇政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1968	李喬（李能棋）	無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1969	鄭清文	無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1970	黃靈芝、沈萌華	黃文相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1971	黃文相	喬幸嘉（陳恆嘉）、黃文相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1972	楊青矗	江上（江文雙）、張秀民	尚未設立	尚未設立	曾財庭
1973	江上（江文雙）	張秀民、司徒門（洪醒夫）	岩上（嚴振興）	凱若	高友直
1974	張秀民	方死生（陳恆嘉）、周梅春、潘榮禮	從缺	曾淑貞、衡榕（筆名）	鄭國貞
1975	馮輝岳	周梅春、潘榮禮	李魁賢	謝武彰	無
1976	從缺	司徒門（洪醒夫）、鍾樺、鄭石棟	蔡潤玉、陳德恩	無	無

（資料來源：張金墻，1997：158-167；作者自行製表）

Survival Through Cracks: The Formation of Native Taiwanese Writers' Community Structure (1950-1973)

Chang, Hao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ok over Taiwan in 1945, most of native Taiwanese (“Benshengren”) writers faced the aporia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writing language and thus gave up their literary careers. However, some writers tried to overcome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by establishing support communit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overall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aiwanese writers from the 1950s to the mid-1970s. By referring to Bourdieu’s field theory and Escarpit’s “Equipe” framework, the study firstly investigates the operations and external structures of the literary field. Secondl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s used to examine the social relations among Taiwanese writers. The finding shows that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among native Taiwanese writers, from mainstream newspaper supplements to writer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were frequent.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not only shaped the prototype of the writer equipe, but also discovered emerging writers, forming an overall community support structure for native Taiwanese writers.

Keywords: field, Equipe, Taiwanese writers, social network, community structure

